

主編 李天綱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经济学（第二辑）

合作运动与世界改造

[美] J. P. Warbase 著 许超 钱江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主编 李天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经济学（第二辑）

合作运动与世界改造

[美] J. P. Warbasse 著 许超 钱江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合作运动与世界改造/(美)韦拔斯(Warbasse,J.P.)著;
许超,钱江译.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李天纲主编. 经济学)

ISBN 978-7-5520-1162-3

I. ①合… II. ①韦…②许…③钱… III. ①世界经济—合作
经济 IV. ①F27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45641号

合作运动与世界改造

主 编: 李天纲

编 纂: 赵 炬

责任编辑: 唐云松

特约编辑: 陈宁宁

封面设计: 清 风

策 划: 赵 炬

执 行: 取映文化

加工整理: 嘎 拉 江 岩 牵 牛 莉 娜

责任校对: 笑 然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电话63875741 邮编200020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排 版: 上海永正彩色分色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常熟市人民印刷厂

开 本: 650×900毫米 1/16开

字 数: 120千字

印 张: 9.375

版 次: 2016年4月第1版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20-1162-3/F.357

定价: 48.00元(精装)

民国西学：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序

李天纲

继唐代翻译印度佛经之后，二十世纪是中文翻译历史上的第二个高潮时期。来自欧美的『西学』，以巨大的规模涌入中国，参与改变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域外知识大规模地输入本土，与当地文化交换信息，激发思想，乃至产生新的理论，全球范围也仅仅发生过有数的那么几次。除了唐代中原人用汉语翻译印度思想之外，公元九、十世纪阿拉伯人翻译希腊文化，有一场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之外，还有欧洲十四、十五世纪从阿拉伯、希腊、希伯来等『东方』民族的典籍中翻译古代文献，汇入欧洲文化，史称『文艺复兴』。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大量翻译欧美『西学』，可以和以上的几次翻译运动相比拟，称之为『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并不过分。

运动似乎是突如其来，其实早有前奏。梁启超（1873-1929）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自明末徐光启、李之藻等广译算学、天文、水利诸书，为欧籍入中国之始。』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发动的明末清初天主教翻译运动，比清末的『西学』早了二百多年。梁启超有所不知的是：利、徐、李等人不但翻译了天文、历算等『科学』著作，还翻译了诸如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灵言蠡勺》）、《形而上学》（《名理探》）等神学、哲学著作。梁启超称明末翻译为『西学东渐』之始是对的，但他说其『范围亦限于天（文）、（历）算』，则误导了他的学生们一百年，直到今天。

从明末到清末的『西学』翻译只是开始,而且断断续续,并不连贯成为一场『运动』。各种原因导致了『西学』的挫折:被明清易代的战火打断;受清初『中国礼仪之争』的影响;欧洲在1773年禁止了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以及儒家保守主义思潮在清代的兴起。鸦片战争以后很久,再次翻译『西学』,仍然只在上海和江南地区。从翻译规模来看,以上海为中心的翻译人才、出版机构和发行组织都比明末强大了,影响力却仍然有限。梁启超说:『惟(上海江南)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种,李善兰、华蘅芳、赵仲涵等任笔受。其人皆学有根底,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李。』梁启超对清末翻译的规模估计还是不足,但说『戊戌变法』之前的『西学』翻译只在上海、香港、澳门等地零散从事,影响范围并不及于内地,则是事实。

对明末和清末的『西学』做了简短的回顾之后,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二十世纪的中文翻译,或曰中华民国时期的『西学』,才是称得上有规模的『翻译运动』。也正是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数以千计的『汉译名著』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必读教材。1905年,清朝废除了科举制,新式高等教育以新建『大学堂』的方式举行,而不是原来尝试的利用『书院』系统改造而成。新建的大学、中学,数理化、文史哲、政法等等学科,都采用了翻译作品,甚至还有西文原版教材,于是,中国读书人的思想中又多了一种新的标杆,即在『四书五经』之外,还必须要参考一下来自欧美的『西方经典』,甚至到了『言必称希腊、罗马』的程度。

我们在这里说『民国西学』,它的规模超过明末、清末;它的影响遍及沿海、内地;它借助二十世纪的新式教育制度,渗透到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中,这些结论虽然都还需要论证,但从一般直觉来看,是可以成立的。中国二十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及『现代化』、『世俗化』、『理性化』,都与『民国西学』的翻译介绍直接有关。然而,『民国西学』到底是一个多大的规模?它是一

个怎样的体系？它们是以什么方式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认真研究，我们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还有，哪些著作得到了翻译，哪些译者的影响最大？『西学东渐』的代表，明末有徐光启，清末有严复，那『民国西学』的代表作在哪里？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并不能明确地回答，原因就在我们对民国翻译出版的西学著作并无一个全程的了解，民国翻译的那些哲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西学』著作，束之高阁，已经好多年。

举例来说，1935年，上海生活书店编辑《全国总书目》，『网罗全国新书店、学术机关、文化团体、图书馆、政府机关、研究学会以及个人私家之出版物约二万种』。就是用这二万种新版图书，生活书店编制了一套全新分类，分为：『总类、哲学、社会科学、宗教、自然科学、文艺、语文学、史地、技术知识』。一瞥之下，这个图书分类法比今天的『人大图书分类法』更仔细，因为翻译介绍的思潮、学说、学科、流派更庞大。尽管并没有统一的『社科规划』和『文化战略』，『民国西学』却在『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推动下得到了长足发展。查看《全国总书目》（上海，生活书店，1935），在『社会科学·社会学一般·社会主义』的子目录下，列有『社会主义概论、社会主义史、科学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议会派社会主义』等；在『社会科学·政治·政体政制』的子目录下，列有『政治制度概论、政治制度史、宪政、民主制、独裁制、联邦制、各种政制评述、各国政制、中国政制、现代政制、中国政制史』等，翻译、研究和出版，真的是与欧美接棒，与世界同步。1911年以后的38年的『民国西学』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而我们却长期忽视，不作接续。

编辑出版一套『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把中华民国在大陆38年期间翻译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著作重新刊印，对于我们估计、认识和研究『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接续当

时学统，无疑是有着重要的意义。1980年代初，上海、北京的学术界以朱维铮、庞朴先生为代表，编辑『中国文化史丛书』，一个宗旨便是接续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重振旗鼓，『整理国故』，先是恢复，然后才谈得上去超越。遗憾的是，最近三十年的『西学』研究却似乎没有采取『接续』民国传统的方法来做，我们急急乎又引进了许多新理论，诸如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还有『老三论』、『新三论』、『后现代』、『后殖民』等等新理论，对『民国西学』弃之如敝屣，避之唯恐不及。

民国时期确实没有突出的翻译人物，我们是指像严复那样的学者，单靠『严译八种』的稿酬就能成为商务印书馆大股东，还受邀请担任多间大学的校长，几份报刊的主笔。但是，像王造时（1903-1971）先生那样在『西学』翻译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然后借此『西学』，主编报刊、杂志，在『反独裁』、『争民主』和『抗战救国』等舆论中取得重大影响的人物也不在少数。王造时的翻译作品有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摩瓦特的《近代欧洲外交史》、《现代欧洲外交史》、拉铁耐的《美国外交政策史》、拉斯基的《国家的理论与实际》、《民主政治在危机中》。1931年，王先生曾担任光华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政治系主任，后来创办了《主张与批评》（1932）、《自由言论》（1933），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2）。他在上海舆论界发表宪政、法治、理性的自由主义；他在大学课堂上讲授的则是英国费边社社会主义、工联主义和公有化理论（见王造时著《荒谬集·我们的根本主张》，1935，上海，自由言论社）。非常可惜的是，王造时先生这样复杂、混合而理想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和实践，在最近三十年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中并无讨论，原因显然是与大家不读，读不到，没有再版其作品有关。

我们说，『民国西学』本来是一个相当完备的知识体系，在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断裂』之后，学者并没有好好地反省一下，哪些可以继承和发展，哪些应该批判和扬弃。民国时期好多重要的翻译著作，我

们都没有再去翻看，认真比较，仔细理解。『改革、开放』以后，又一次『西学东渐』，大家只是急着去寻找更加新颖的『西学』，用新的取代旧的，从尼采、弗洛伊德……到福柯、德里达……就如同东北谚语讽刺的那样：『熊瞎子掰包谷，掰一个丢一个。』中国学者在『西学』宝库中寻找更新式的装备，在层出不穷的『西学』面前特别害怕落伍。这种心态里有一个幻觉：更新的理论，意味着更确定的真理，因而也能更有效地在中国使用，或者借用，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这种实用主义的『西学观』，其实是一种懒惰、被动和浮躁的短视见解，不能积累起一个稍微深厚一点的现代文化。

讨论二十世纪的『西学』，一般是以五四『新青年』来代表，这其实相当偏颇。胡适、陈独秀等人固然在介绍和推广『西学』，倡导『启蒙』时居功至伟，但是『新文化运动』造成不断求新的风气，也使得这一派的『西学』浅尝辄止，比较肤浅，有些做法甚至不能代表『民国西学』。胡适先生回忆他们举办的《新青年》杂志，有一个宗旨是要『输入学理』，即翻译介绍欧洲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知识，他还大致理了一个系统，说『我们的《新青年》杂志，便曾经发行过一期『易卜生专号』，专门介绍这位挪威大戏剧家易卜生，在这期上我写了首篇专论叫《易卜生主义》。《新青年》也曾出过一期『马克思专号』。另一个《新教育月刊》也曾出过一期『杜威专号』。至于对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日耳曼意识形态、盎格鲁·萨克逊思想体系和法兰西哲学等等的输入，也就习以为常了。』（唐德刚编译：《胡适口述自传》，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年，第191页）。胡适晚年清理的这个翻译目录，就是那一代青年不断寻找『真理』的轨迹。三四十年间，他们从一般的人性论学说，到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从不列颠宪政学说，到法兰西暴力革命理论、德意志国家主义思想，再到英格兰自由主义主张，大致就是『输入学理』运动中的全部『西学』。

胡适一语道破地说：『这些新观念、新理论之输入，基本上为的是帮助解决我们今日所面临的实际

问题。』胡适并不认为这种『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的做法有什么不妥。相反，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学』的方法论，大多认为翻译为了『救国』，如同进口最新版本的克虏伯大炮能打胜仗，这就是『天经地义』。今天看来，这其实是一种庸俗意义的『实用主义』，是生吞活剥，不加消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简单思维，或曰：是『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从我们收集整理『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的情况来看，『民国西学』是一个比北大『启蒙西学』更加完整的知识体系。换句话说，我们认为『五四运动』及其启蒙大众的『西学』并不能够代表二十世纪中国西学翻译运动的全部面貌，在大的『启蒙西学』之外，还有上海出版界翻译介绍的『民国西学』。或许我们应该把『启蒙西学』纳入『民国西学』体系，『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

我们认为：中国二十世纪的西学翻译运动，为汉语世界增加了巨量的知识内容，引进了不同的思维形式，激发了更大的想象空间，这种跨文化交流引起的触动作用才是最为重要的。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变得不古不今，不中不西，并非简单的外来『冲击』所致，而是由形形色色的不同因素综合而成。外来思想中包含的进步观点、立场、方案、主张、主义……具有普世主义的参考价值，但都要在理解、消化、吸收后才能成为汉语语境的一部分，才会有更好的发挥。在这一方面，明末徐光启有一个口号可以参考，那便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反过来说，『翻译』的目的，是为了中西文化之间的融会贯通，而非搬用；『会通』的目的，不是为了把新旧思想调和成良莠不分，而是一种创新——『超胜』出一种属于全人类的新文明。二十世纪的『民国西学』，是人类新文明的一个环节，值得我们捡起来，重头到底地细阅读，好好思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邀我主编『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献弁言于此，是为序。

合作運動與世界改造目錄

序言

第一章 戰後的情形

(一)

直接的行動

(一)

合作的可能性

(四)

最近的發展

(一〇)

合作住宅

(一五)

合作保健

(一七)

第二章 合作的方法和意義

(二四)

合作實務

(二四)

合作事業與營利事業的關係

(二七)

消費者的合作製造

(三一)

大規模合作事業

(三六)

合作的國際聯繫

(三八)

第三章 合作與政府的關係……………(四三)

國營事業與行動的自由……………(四三)

社會主義的影響……………(四六)

政府對合作事業的態度……………(五一)

政府的贊助……………(五三)

第四章 情況的演變……………(五八)

重建世界……………(五八)

世界的安全……………(六二)

公平的開端……………(六八)

趨向國家主義……………(七五)

貨幣與租稅……………(七七)

合作經濟與世界和平……………(八三)

第五章 合作活動……………(八七)

一種普及全球的運動……………(八七)

歐洲的合作……………(八八)

亞洲的合作·····	(九六)
美洲的合作·····	(九七)
其他各地的合作·····	(一〇〇)
第六章 維護民主 ·····	(一〇二)
理想和可能的結果·····	(一〇二)
改造過程中的障礙·····	(一〇七)
民主和反民主·····	(一一四)
社會和社會教育·····	(一二二)

第一章 戰後的情形

直接的行動

在所有從納粹法西斯統治下解放出來的國家內，人民都遭受到衣食住的缺乏，他們在迫切的經濟問題未獲解決的情況下，與疾病死亡相鬥爭。但戰勝國軍政兩方的統治者，都始終致力於人民的政治組織的建立。這種行動係從以政府為特別重要的流行觀念所產生。人民所缺乏的是衣，食，住；但是他們所獲得的却是政府官吏。

假如這些飢餓的人民和森林中頭腦簡單的野獸一樣，那末他們不需要為政治而煩惱，他們將以求食為第一。但戰勝國家都受困于政治組織的重要性。他們依賴政治的方法，以滿足那些因政府作戰而陷于貧乏的飢民的需要。

戰勝國來到難民區的大多數代表，都是軍人和政府人員，他們的思想自然集中于政治行動。但是開創政治的組織，很耗費時間并且引起無限的糾紛。政治組織需要組織政黨，而政黨又彼此仇視與爭論。這些衝突在那些應該團結零食的飢民間進行着。意大利，比利時，希臘，以及其他各國的飢餓羣衆，洶湧過市，用他們的精力去相互反對，并且反抗那種加諸他們身上的政體。他們始終意識到他們的飢餓，也意識到民主自治的需要。

當這些人民擠鬧在一起，擁護這個政黨或那個政黨，或是要首相辭職的時候，外面的影響阻止了他們對建設行動的自我表示，或是轉移他們走上不生產的努力。同時却有未耕種的田地 and 沒有人的工廠存

在着。現在空虛的伙食房和空虛的肚子，是計劃與方法混亂的結果。

「我們需要麵包」的叫喊，是用簡單的語言所表示的需要，但並沒有指出獲取麵包的方法。所以人民沒有滿足。這種不滿足的性質是混亂的，但是關於他們的需要則並未混亂。在歐洲，差不多一百年以來，他們都被灌以求政府解決社會問題的觀念。而政府却仍舊使他們失望。在他們之間雖然也有合作領袖的呼聲，但終是政治觀念佔了優勢。他泛濫出直接行動的要求。

爭取物品的本能使人民困擾。然後他們開始思想和合作以使自己脫離困擾。的確，困擾有許多。難道還不足以使人民發生合作思想嗎？在他們的智慧步入有效行動之前，他們一定要更深地沉溺于混亂嗎？他們以政治組織為真正的合作，當作可以替他們解決問題的合作。這就是他們離開直接行動而走到無限複雜之處的原因所在。公民的政治組織趨向于權力的集中。政治組織又常有擴大而逃避人民管制的趨勢。人民自身的地位，一步一步地由主宰政治而變成服從政治。政治組織從控制人民走到控制事物，然後占有事物。最後實現了獨裁政治。這就是現代政治的趨勢。

當這種現象正在進展的時候，人民以為他們能够以自己的利益，來民主地管理政府。他們的思想是正確的，並且還有合作的提示。但是有一個問題，就是由政治組織究竟可以達到多少合作。還有一個問題就是這種組織可以產生多少經濟效果。

有些人所抱的看法，以為合作有兩種：即自願的和強迫的。後一種以政治性的政府來代表。此地所討論的合作是自願的經濟合作。他與政府無關。倘若要說明合作觀念的全部意義，那就是他必需是自願的與經濟的。將合作置于一切社會活動的普遍範圍內就與政治活動相混，實則以合作方法辦理經濟事務有明確的途徑。

我們現在生存在一個對簡單原則了解不清楚的世界內。兩種人爲的機構使得人心從他們所需要的事物上，移轉到用來獲得那些事物的工具上。設立政府與獲得貨幣，是兩種使注意力從生活本身分散的事業。而生活却比這兩種事業都更爲重要。

經營經濟事業之流行的方法，是以獲得貨幣爲基礎。貨幣不再限定爲計數之用，牠本身獲得了獨特崇高的價值。這觀念就是有了這種貨幣，然後可以獲得東西。但是一個專門注意于獲得貨幣的社會，誇張貨幣的重要，結果却沒有獲得東西。使主要的要求成爲次要，主要的要求就受到損害。同時，現在貨幣也許很多，但全球有半數的人却都缺少東西。這是一個奇怪的事實，就是美國人在這個有充足的貨幣與無限生產力的時代，適當的衣，食，住，和燃料，却比兩百年前所得到的要少。所以他們要自己寧可獲得東西，不要貨幣。

曾經一度在美國流行的家庭農場的情形可用以說明。家庭組成了一個自然的消費合作社。他們使用他們所生產的物品。他們不想到農產品的價格；他們祇想到產品的使用價值。他們共同工作並不要獲得貨幣，而是要獲得物品。結果他們沒有獲得貨幣，但確是獲得了物品。他們衣食住都很好。他們沒有把農田抵押掉。他們教育強健的男人和女人，具有一種依靠自己的意識。

如今這種做事的自然方法，可以從家庭擴張到一切社會。那種古代的原始方法，可以用奇異的現代科學的生產，運輸，和交通方法來代替。這就是消費合作組織的方法和目的。他在被簡接的行動所擾亂了的世界，來代表直接行動。

合作方法是一種事業亦是一種社會活動。可與營業利事及政府共同存在，使用他們的通貨，輔助他們的不足，並且因功效顯著而可逐漸發展。這種合作方法貢獻出人們尚未充分了解的利益，以及尚未適

當採用的方法。

消費合作是一種民主聯合的方法，以此各個人實行互助聯合而直接供應他們的需要。至其可能性與成就，則將于下文說明。

合作的可能性

倘若要得到世界的安定，必須要實行那種與支配過去相異的經濟和政治習慣。使房屋整齊，以便放火燒去的方法，是無意義的事情。過去的經濟和政治方法已證明他們要造成戰爭。所以和平的世界需要其他的方法，需要能够有效地供給人類所需，以及造成安定的社會之生產和分配方法。以民主作為政治理想是不够的。民主必需要支配經濟和政治事務，否則是不有意義的。

合作經濟是以異于現在所盛行的動機和方法為基礎。他代表民主的實際應用。他已穩穩地發展了一百年，直到現在他已深入地球的每一角落。並且接觸到全球四分之一人口的生活。

這種事業的合作方法，提倡和協，反對分歧。和協是牠的特性，否則就不成為合作。合作方法在供應人們需要的事業組織內表現出來。合作事業在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切國家內部已發達。這些被侵略國和未被侵略國內的合作組織，都準備幫助建設一個穩定的世界經濟。

全世界遭受破壞的經驗以後。救濟是第一件重要的事情。數百萬人缺乏必需品而要求對於他們迫切災害的救濟。慈善家心中的仁慈精神激動他們去幫助。缺少和不滿足阻礙了秩序的恢復。飢餓與受苦妨礙了國際貿易的建立。

在辦理救濟中，可能利用那種非臨時的以及在急迫的需要滿足以後不立刻停止的方法。以慈善的

和政治的方法救濟災難是通常所用的手段。但是合作方法却指向一條用以開始一種永久的經濟事業的路線。合作供應急迫需要的救濟之後，繼續成爲進行生產與分配的經常方法。在臨時的手段中，合作方法並不使時間與努力損失，但是一種可能無與擴張的組織與供給需要的方法是採用了。救濟計劃繼續進行並轉變爲改造。這是由於民主地聯合起來替他們自己辦事的人們所完成。起先被介紹了自助，而自助又繼續擴大，最後建立了一種基於這種自助原則的永久經濟。

在那些不採取全部管制的國家內，合作事業在戰時較通常更有生氣地發展。希望他們有進一步的擴張。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六日美國白勃生新聞報(Babson News Letter)曾作如下的預測：「合作的生產與分配，即使在戰時的限制經濟下仍舊繼續生長。希望戰後的合作事業向著使生產者與消費者較前更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這個方向去迅速發展。」英國的殖民地部長麥克密倫(Rt Hon Harold Mac Millan)於一九四三年十一月間向下議院報告的時候，促請「研究在戰後可適用於殖民地的合作形式，其用意在使殖民地逐漸參與辦理他們自己之事務。」

在被侵略的國家內，合作事業已經停頓。他們現在正在進行恢復。他們很適宜地先做分配救濟品的工作，繼而從事建設。戰前歐洲國家內的消費合作，已全國性地聯合起來辦理合作批發，而一切的合作批發又都兼營製造業。這樣，這些消費者都知道如何替他們自己生產一部份他們所需要的商品。

其合作事業是國際合作聯盟會員的那些國家，有合作銀行和保險業務的全國聯合會。他們還有屬於地方合作社聯合會所有的全國合作批發社和生產工業。

戰前歐洲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口，都有幾分受到合作社的供應。法內斯和納粹統治剝奪了這些合作社的民主。這就是說他們不再是真正的合作了。但這並不是說就是合作的毀滅。合作的觀念仍舊繼續存